

高句丽与汉魏晋及北族政权的朝贡关系

程尼娜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1—5 世纪初,无论是统一王朝时期,还是王朝分裂、政权频繁更替时期,高句丽对中原王朝和北族政权都采取积极朝贡的姿态,朝贡活动呈现出单向、双向、多向的变化,先后向十多个王朝和政权进行朝贡。随着政治形势和朝贡对象的变化,高句丽朝贡活动的目的及其与朝贡对象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变化。

关键词:高句丽;汉魏晋;北族政权;朝贡

中图分类号:K31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5)04-0044-06

Tributary Relationships between Gaogouli and Han Wei Jin and the North Nation Regime

CHENG Ni-na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Gaogouli had taken the actively tributary attitude to the central Dynasty and the north nation regimes whether in the unified Han Dynasty or in the split periods from the first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fifth century. Gaogouli pay tribute to more than a dozen Dynasties and regimes successively and the tributary activities showed the change of unidirectional bidirectional and multi. With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ributary object, the objective of Gaogouli tributary activit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 and the tributary object had some changes.

Key words: Gaogouli; Han Wei Jin; the north nation regime; tributary

1—5 世纪,中国古代王朝处于由统一到分裂的变化时期。位于东北一隅的高句丽国,自建国之日起就成为汉朝东北朝贡制度的成员,此后无论是在统一的汉王朝时期,还是王朝分裂、政权频繁更替时期,高句丽政权始终是中原王朝或北族政权朝贡制度成员,其朝贡活动由单向到多向,甚至建立起以本国为中心的亚朝贡体系。在东亚朝贡体系下,高句丽政权由弱转强,成为东北亚地区强国之一。那么,在这 400 多年间高句丽朝贡活动的动力是什么?如何定位它在东亚朝贡体系中的位置?这种朝贡关系在高句丽政权由弱变强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作用?以往学界关于高句丽历史研究的诸多成果为探讨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外学界对上述

问题或观点分歧较大,或较少探讨。本文通过对 1~5 世纪高句丽朝贡活动的梳理和探析,力图提出新的认识,以就教于方家。

一、高句丽建国之初与汉朝的朝贡关系

“高句丽”又作“高句骊”,其名始见于西汉。汉武帝灭朝鲜侯国之后,“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①。玄菟郡初治沃沮城,日本学者稻叶岩吉认为在今朝鲜咸镜北道的镜城,金毓黻赞同之;《中国历史地图

^①《汉书》卷 6《武帝纪》,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94 页。

集》认为在今朝鲜咸镜南道的咸兴。^①汉昭帝正始五年(前82)，“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②。《汉书·地理志》曰：玄菟郡下设高句骊、上殷台、西盖马三县，“户四万五千六，口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所辖人户多“句骊夷貊”。“高句丽”始以县名见著史籍，以所辖民多“句骊”人而命名。西汉玄菟郡的辖区在吉林省哈达岭以南地区，通化县赤柏松汉代山城地处今吉林与辽宁东部的通化、新宾、桓仁三县交通要冲，应是玄菟郡属县治所^③。玄菟郡仅设三县，人口达22万之多，说明这里统辖机制与内地郡县不同，应是保留当地土著民原有的社会组织和风俗文化实行羁縻统辖形式。

西汉末年，松花江中上游的夫余人朱蒙率人进入玄菟郡内较为偏僻的山谷间——句骊夷聚居地，征服了当地的部落，元帝建昭二年(前37)，建立王国，以玄菟郡治高句丽县名为国名，号称“高句丽国”，王城在今辽宁桓仁县境内。西汉王朝允许边郡地区存在土著民的王国，如南方的南越国、西南的滇国、夜郎国等，由边郡进行羁縻统辖。汉朝以玄菟郡统辖管理高句丽事务，“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渌。沟渌者，句丽名城也”^④。关于高句丽县令管理的高句丽是不是朱蒙建立的高句丽国，西汉王朝是否对高句丽国主进行册封，封号是什么，学界有较大的分歧，不可不辨。

首先，关于高句丽县令所辖高句丽与高句丽国的关系，主要有二种看法：一是认为二者分别是两个高句丽国。丁谦是这一看法的提出者，他认为玄菟郡所辖的是古高句丽国，朱蒙建立的高句丽国在今朝鲜平安道东界万山之中^⑤。近年朴灿奎进一步论证玄菟郡高句丽县所辖的高句丽侯国，是朝鲜史书《三国史记》中的沸流国，塞外朱蒙另建立一个独立的高句丽国^⑥。二是认为二者是同一个高句丽国，这是目前中国学界的通说。朱蒙以玄菟郡内的句骊人建国，受汉朝册封，由高句丽县管理。张博泉认为高句丽国与高句丽族是两个概念，在高句丽国建立之前，高句丽人分布在玄菟郡内不同地区，高句丽县所在地的句丽即是先秦的高夷(后来的消奴部)，又有大水(浑江中下游)句丽是朱蒙建国的句丽部落，此外还有小水句丽。朱蒙建国后第二年征服沸流水高句丽部落，高句丽五部始形成^⑦。张师认为高句丽有不同部，但高句丽国只有一个。我赞同后一种观点，高句丽建国前，玄菟郡各县管理分散的句丽部落朝贡事务，高句丽国建立后由玄菟郡所在地高句丽县管理高句丽国“名籍”与朝贡事务，赐给高句丽国主“鼓吹技人”，令其“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既使在高句丽国主“骄恣”不肯诣郡朝贡

时，还在“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

其次，西汉王朝是否对高句丽国主进行册封，封号是什么？《汉书·王莽传》有一段重要记载：

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驩。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驩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余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余、秽貉复起，此大忧也。”莽不尉安，秽貉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骊侯驩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说，下书曰：“……其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于是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云。

朝鲜史书《三国史记》将此事系于琉璃明王三十一年(12)，但将“高句丽侯驩”改为“将延丕”^⑧。关于高句丽侯驩是不是高句丽国主，是哪个高句丽国主？学界多有论述，李大龙对此有所梳理，他根据《元丰类稿》和《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高句丽王世系中有“驩”，认为高句丽侯驩是高句丽王，《三国史记》删掉驩的事迹，是为了掩盖高句丽王被杀的事实^⑨。我赞同驩是高句丽国主的看法，但不赞同学界普遍认为西汉王朝册封高句丽国主为“王”，到王莽时改为“侯”的看法。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国自建立(前37)直到太武大王二十二年(74)用了百余年的时间才完成对高句丽、貊(貉)各部的统一，高句丽建国初年仅是玄菟郡境内一个弱小的部落联

①金毓黻：《东北通史》，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翻印1980年版，第68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4页。

②《后汉书》卷85《东沃沮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17页。

③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集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6、41页。

④《三国志》卷30《魏书·高句丽》，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43页。

⑤丁谦：《后汉书东夷传地理考证·附高句骊国有二考》，浙江图书馆刊行，民国四年(1915)版，第7页。

⑥朴灿奎：《王莽朝高句丽记事的诸史料辨析——王莽朝高句丽记事与高句丽侯驩考(上)》，《延边大学学报》2000年3期。

⑦张博泉：《夫余与高句丽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117、121、139页。

⑧[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3《高句丽本纪第一·琉璃明王》，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页。

⑨李大龙：《关于高句丽侯驩的几个问题》，《学习与探索》2003年5期。

盟体,西汉王朝对高句丽国主的册封是“高句丽侯”,而不是“高句丽王”。《汉书·王莽中》记载派使者四出改四夷称王者为侯时,并无改高句丽王为侯的事迹,陈寿注意到这一点,故《三国志·高句丽传》云:高句丽“当此时为侯国”。其后王莽所改的是高句丽国号,“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而不是高句丽国主的封号。

那么驸是高句丽的第几位国主?据《元丰类稿》所载驸是高句丽的第四位国主^①,《三国史记》高句丽国主无“驸”名,但将《汉书》所记高句丽侯驸的事迹系于第二代国主琉璃明王时期。高句丽侯驸与下一代国主交替时期,正是高句丽国由塞内封国转为塞外政权时期。在高句丽侯驸及其以前的时代,高句丽国由玄菟郡高句丽县令主其“名籍”,汉朝赐予高句丽国主“朝服衣帻”,遇战事郡长官“发高句骊兵”,若高句丽兵“不欲行,郡强迫之”,高句丽军队出现叛乱,“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驸”,这都展现了高句丽国作为塞内边地封国受当地郡县管理的统辖关系。而当王莽将严尤诱斩高句骊侯驸之后,高句丽人皆亡出塞,正与《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国迁王城之事契合。因此我认为如果《三国史记》记载公元 3 年,高句丽“迁都于国内,筑尉那岩城”^②的时间无误的话,琉璃明王迁都(新王城在今吉林集安境内)以前事迹当为高句丽侯驸在位时期的事迹,那么驸可能是高句丽国第二位国主。当然也可能《元丰类稿》记载高句丽国主的世系无误,《三国史记》记载琉璃明王在位时间或高句丽迁王城的时间有误。高句丽出塞后,愈加犯边,造成东北高句丽与西南夷叛乱相呼应的局面。

光武帝重建汉王朝后,建武八年(32),高句丽国主遣使朝贡。《三国志·魏书·高句丽传》云:“始见称王”;《后汉书·高句骊传》云:“光武复其王号”。朴灿奎据《三国志》记载认为汉朝并不知高句丽的最高统治者已经称王,而只是通过朝贡得知了这一点^③。我认为高句丽出塞之后,国主在对外交往时不再使用汉朝册封的封号“高句丽侯”,而自行称“王”,光武帝因之册封高句丽国主为“高句丽王”,这一封号高于西汉王朝所授的“侯”,以示特别恩宠与怀柔。光武所复王号,当是由“下句骊”恢复为“高句骊”。东汉时期,东北民族朝贡的地点与西汉时期相同,仍以边郡为主,朝廷只要求朝贡国的国主要适时诣阙朝贡,通常是在遇有大事时。塞外的高句丽仍岁时诣玄菟郡(曾一度诣辽东郡)朝贡。由于高句丽失去了在郡县内居住的优越条件,其生活环境多大山深谷,无原泽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为了解决物质需求,高句丽王往往是一面遣使朝贡,一面派兵寇掠边郡。据史书记载统计,东汉时期高句丽曾 7 次遣使诣阙朝贡,有 6 次是在反叛之后重新归附之时,如建武二十五年(49),“句骊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而辽东太

守祭彤以恩信招之,皆复款塞”,高句丽“上貂裘好马,帝辄倍其赏赐”^④。高句丽向汉朝贡纳的物品主要是貂裘、马匹。高句丽王本人并没有遵守适时诣阙朝贡的规定,是东汉王朝东北朝贡体制下不太安分的成员之一。

汉朝出于传统的“天下观”和营建华夷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理念建构东亚朝贡体制,采取怀远招徕政策经营着边疆朝贡制度,对于朝贡成员叛服无常表现出十分宽容的态度,只要反叛者重新愿意归附,汉朝都予以接纳,并给予册封和赏赐。安帝元初五年(118)高句丽出兵袭玄菟,焚烧、抄掠辽东郡的候城、辽隧县,连年数寇二郡。汉朝以“(高句丽王)官为二郡害,兴师伐之”^⑤,辽东、玄菟二郡与朝贡成员夫余国合兵大败高句丽^⑥。这年,高句丽王宫卒。翌年,新继位的高句丽王遂成诣玄菟降,还汉生口,并遣使赴京朝贡,安帝诏曰:

遂成等桀逆无状,当斩断菹醢,以示百姓,幸会赦令,乞罪请降。鲜卑、濊貊连年寇钞,驱略小民,动以千数,而载送数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后,不与县官战斗而自以亲附送生口者,皆与赎直,缣人四十匹,小口半之^⑦。

安帝此次下诏是采纳了尚书陈忠的建议,对高句丽王“责让前罪,赦不加诛”,以缣帛赎买被高句丽掠夺的人口,前提是“不与县官战斗”,做安分守己的朝贡成员。汉朝对其实行以安抚为主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取其善”^⑧,维护边郡安宁。之后,二十余年高句丽堡塞无事。

东汉中期以后,高句丽逐渐强盛,不断出兵征服周边弱小的族群,其东邻沃沮人“遂臣属句丽。句丽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统责其租税,貂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担负致之,又送其美女以为婢妾,遇之如奴仆”。到东汉末,朝鲜半岛东部的秽人也“更属句丽”^⑨。可见,在东汉后期,高句丽也形成了自己的朝贡体系,因高句丽为汉朝的朝贡成员,可视为从属于汉

①(宋)曾巩:《元丰类稿》卷 31,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1937)版,第 347 页。

②[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 13《高句丽本纪第一·琉璃明王》,第 178 页。

③朴灿奎:《王莽朝高句丽记事的诸史料辨析——王莽朝高句丽记事与高句丽侯驸考(上)》,《延边大学学报》2000 年 3 期。

④《后汉书》卷 85《高句骊传》、卷 20《祭彤传》,第 2814、745 页。

⑤《三国志》卷 30《魏书·高句丽传》,第 844—845 页。

⑥⑦⑧《后汉书》卷 85《高句骊传》,第 2814、2815、2815 页。

⑨《三国志》卷 30《魏书·东夷传》,第 846、848 页。

朝贡制度的亚朝贡体系。在汉代高句丽无论弱小还是强盛,即便是不断寇抄边郡时期,都没有脱离汉王朝东北朝贡体制,除了汉朝积极经营朝贡制度之外,还要从高句丽自身利益寻找原因,首先在周边各族都是汉王朝朝贡成员的环境下,高句丽王只有得到汉朝的册封才能得到周边民族的认可和本国贵族大姓的拥护,巩固其统治地位。其次只有加强与经济发达地区人们进行交往和贸易,才能发展本国经济与文化,汉人郡县是这一地区最为发展的地区,加上汉朝厚往薄来的边疆政策,朝贡活动是最为有效的交往活动,寇边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这应是高句丽始终保持与汉朝朝贡关系的主要动力。

二、高句丽与曹魏、西晋王朝的朝贡关系

东汉末年,王朝进入分裂时期。相继建立的魏蜀吴三国为追求正统地位进而实现大一统梦想,都十分积极经营边疆朝贡制度,东亚朝贡体系并没有因为中央王朝的分裂而解体,反而进入进一步发展时期。西晋实现短暂统一,继承了前朝的朝贡制度。高句丽始终是东亚朝贡制度的成员。

三国时期,州一级行政建制已经正式确立。曹魏时期,主要以幽州(今北京)刺史和设在襄平(今辽宁辽阳市)的护东夷校尉统辖东北塞内外朝贡成员。西晋时期,分设平州(治襄平),平州的护东夷校尉和幽州的护乌桓校尉(二校尉通常分别以平州、幽州军政长官兼任)分管东北东、西部塞内外朝贡成员^①,高句丽由东部护东夷校尉统领。这一时期中原王朝或忙于统一战争,如曹魏对吴蜀之战;或困于内部战乱频出,如西晋八王之乱,无暇顾及东北边疆朝贡制度成员是否适时诣阙朝贡。关于地方州郡管理的一般朝贡活动史书多不载,只是边疆有重大事件才见于记载,但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些许在魏幽州、护东夷校尉管理下高句丽的活动信息。

东汉末年公孙氏割据辽东,高句丽成为公孙氏政权的朝贡成员,如高句丽王伯固“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助公孙度击富山贼,破之”^②。高句丽与孙吴发生朝贡关系,实起于公孙氏政权通吴之举。孙吴嘉禾二年(233),孙权派遣册封公孙渊的使者张弥、许晏等人到辽东襄平后,公孙渊将吴使团中的秦旦、张群、杜德、黄强等扣留于玄菟郡40天之久,秦旦等人由玄菟郡逃往高句丽。高句丽王遣使向孙吴政权朝贡,“奉表称臣,贡貂皮千枚,鸕鸡皮十具”。两年后,嘉禾四年(235)孙权派遣使者谢宏、中书陈恂,拜高句丽王宫为单于,加赐衣物珍宝。此时曹魏对高句丽与孙吴的关系似有耳闻,幽州刺史示意高句丽王宫不得臣属孙吴,“令以吴使自效”^③。高句丽王宫则因主簿管咨、带固等30余人被吴使扣留,遣使贡纳数百匹马以示谢罪,并接受了孙吴的册封。但第二年

(236)“春二月,吴王孙权遣使者胡卫通和,王留其使”^④。“七月,高句丽王宫斩送孙权使胡卫等首,诣幽州”^⑤。此后,高句丽不再与孙吴通使朝贡。在这次高句丽与孙吴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幽州刺史及时掌握了高句丽与孙吴交往的动向,令其“以吴使自效”。因吴使陈奉的警觉,高句丽王未能按照幽州刺史的指令办。但当孙吴再次遣使到高句丽时,高句丽王便将其斩首送至幽州,将功折罪。

238年曹魏灭公孙氏政权以后,在襄平设护东夷校尉府^⑥,魏晋时期高句丽主要诣襄平(平州)朝贡。这一时期,高句丽处于早期国家阶段,呈现出对外扩张、频繁四处掠夺的特点。公孙氏政权的公孙康时期,高句丽王伯固“数寇辽东,又受亡胡五百余家。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⑦。曹魏正始中,高句丽王位宫频繁寇抄边郡,幽州刺史毋丘俭“以高句丽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句丽王宫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大战梁口,宫连破走。俭遂束马县车,以登丸都,屠句丽所都,斩获首虏以千数。……刻石纪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诸所诛纳八千余口,论功受赏,侯者百余人”^⑧。清光绪三十年(1904),辑安县(今吉林集安)板岔岭发现一块残碑,正是当年毋丘俭于丸都山留下的《记功碑》。残碑仅存7行48字,王国维对这块残碑进行了补正,提出毋丘俭征讨高句丽“实以四年会师,五年出兵,六年旋师”的看法^⑨。但学界还有另一种看法认为毋丘俭征讨高句丽是二次,即五、六年各出兵一次^⑩。毋丘俭征讨高句丽无论是一次还是两次,这场战争前后持续了二年,攻入高句丽王城,“屠其所都”,王与诸加(贵族大臣)流亡于沃沮,毋丘俭诛杀与迁走的高句丽人口达8000多人,这场战争十分惨烈,高句丽几乎亡国。可见在举行大规模讨伐高句丽战争时,是

①参见程妮娜:《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8—83页。

②⑦《三国志》卷30《魏书·高句丽传》,第845页。

③《三国志》卷47《吴书·孙权传》注引,第1139—1140页。

④[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五》,第208页。

⑤《三国志》卷3《魏书·明帝纪》,第107页。

⑥[日]池内宏:《曹魏の东方经略》,《满鲜史研究》上世第一册,吉川弘文馆1979年版。

⑧《三国志》卷28《魏书·毋丘俭传》,第762页。

⑨王国维:《魏毋丘俭丸都山记功石刻跋》,《观堂集林(外二种)》卷20,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88页。

⑩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由幽州刺史统领邻近高句丽的玄菟、乐浪、带方三郡军队出征^①。其后,高句丽再次恢复了与曹魏的朝贡关系。

西晋时关于高句丽的记载极少,西晋末年,政局不稳,包括汉族官吏在内的各族割据势力之间战事频繁。幽州刺史王浚承制以妻舅崔毖为平州刺史、护东夷校尉^②,管辖包括高句丽在内东北民族的朝贡事务。《晋书·慕容廆载记》记载:“毖意廆拘留,乃阴结高句丽及宇文、段国等,谋灭廆以分其地。太兴初(318),三国伐廆”,“廆将(崔)熹示以攻围之处,临之以兵,……熹与数十骑弃家室奔于高句丽”。高句丽王听从护东夷校尉崔熹的调遣,与宇文鲜卑、段氏鲜卑合兵攻打慕容鲜卑,崔熹兵败后,与数十骑弃家室奔于高句丽,透露了高句丽与护东夷校尉的政治关系。高句丽与魏晋王朝的关系是高句丽与汉朝朝贡关系的延续,保持了原有的统治机制。

三、高句丽与东晋、中原北族政权的朝贡关系

西晋短暂的统一崩溃后,东晋偏安江南,北方地区各族纷纷建立政权,此起彼伏激烈地角逐中原,偏居东北一隅的高句丽也表现出强烈的对外发展欲望,尽管遇到慕容鲜卑诸燕政权的阻力,但高句丽仍然能够在开展多向朝贡活动中逐步走向强大。

永嘉战乱爆发后,“辽东张统据乐浪、带方二城与高句丽王乙弗利相攻,连年不解。乐浪王遵说统帅其民千余家归廆,廆为之置乐浪郡,以统为太守,遵参军事”^③。《十六国春秋》将此事系于晋愍帝建兴年间(313—316),大约在这个时期,高句丽占据了汉魏以来建立在朝鲜半岛北部的乐浪郡、带方郡^④。趁中原陷于战乱,各族政权分立,高句丽力图向辽河流域发展,遇到的最大的对手便是慕容鲜卑。东晋元帝于太兴三年(320)册封慕容廆为“监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户”^⑤。这个“平州刺史”已经不是晋朝的地方官吏,而是朝贡制度成员的封号。《北史·高丽传》记载:“晋永嘉之乱,鲜卑慕容廆据昌黎大棘城,元帝授平州刺史。位官玄孙乙弗利频寇辽东,廆不能制。”可见高句丽并没有将慕容廆视为中原王朝的官员,而是看做与自己同样身份的朝贡国。为了寻求中原政权的支持,高句丽积极开展对中原北族政权和南方东晋王朝的朝贡活动。

在北方,高句丽遣使向势力强大的后赵朝贡。石勒建平元年(330),“高句丽、肃慎致其楷矢”,高句丽成为后赵的朝贡成员。石季龙时因攻打段辽之事与慕容廆发生矛盾,“季龙谋伐昌黎,遣渡辽曹伏将青州之众渡海,戍蹋顿城,无水而还。因戍于海岛,运谷三百万斛以给之。又以船三百艘,运谷三十万斛诣高句丽。”^⑥然在后赵与慕容鲜卑的角逐中,慕容鲜卑多占上风,高句丽向后赵朝贡的目的落空。于是高句丽又遣使向东晋朝贡。晋

成帝咸康二年(336),“高句丽遣使贡方物”;晋康帝建元元年(343),“高句丽遣使朝献”^⑦。然而,此时慕容鲜卑也是东晋的朝贡成员,东晋更重视实力较强的慕容鲜卑,高句丽的朝贡活动同样没有达到目的。

晋成帝咸康三年(337)慕容皝自称燕王,七年(341)得到东晋成帝的册封,“拜皝使持节、侍中、大将军、大都督河北诸军事、幽州牧、大单于、燕王”^⑧。翌年,慕容皝便以“燕王”之尊,行大将军事,亲征高句丽。燕四万大军攻破高句丽都城,掘高句丽王钊“父乙弗利墓,载其尸并其母妻,收其府库累世珍宝,掠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宫室,毁丸都城,而还”。晋康帝建元元年(343)春二月,“高句丽王钊遣其弟称臣于皝,贡方物以千数,乃还其父尸,犹留其母为质。”^⑨在前燕的军事征服之下,高句丽被迫成为前燕政权朝贡制度的成员,接受前燕的册封,“以钊为录营(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乐浪公,王如故”^⑩。384年后燕建立,永康二年(397)后燕遭北魏重创几乎亡国,慕容宝将都城由中山迁至龙城(今辽宁朝阳),着力经营东北统治,在后燕军威下,长乐元年(399)“高句丽王安遣使贡方物”,燕王慕容宝册封“句丽王安为平州牧,封辽东、带方二国王”^⑪。407年北燕取代后燕,高句丽与北燕是否有朝贡册封关系史无记载,但从北燕王冯弘“素侮高丽,政刑赏罚,犹如其国”^⑫。高句丽与北燕之间可能存在朝贡关系并维系到北燕末年^⑬。

①其中“玄菟太守”是根据王国维的考证。《毋丘俭九都山纪功石刻》残存7行文字,遗失部分或许有护东夷校尉。

②《晋书》卷39《王浚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48页。

③(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卷23《前燕录一·慕容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此后中国史籍记载的乐浪郡、带方郡,一般是指侨置于辽西地区的二郡。

⑤《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7页。

⑥《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47、2768页。

⑦《晋书》卷7《显宗成帝、康帝纪》,第180、186页。

⑧⑨《十六国春秋》卷25《前燕录三·慕容皝下》。

⑩《十六国春秋》卷27《前燕录五·慕容儁下》。

⑪《北史》卷94《高丽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12页。

⑫《十六国春秋》卷99《北燕录二·冯宏》。

⑬关于高句丽与诸燕政权的朝贡关系,参见程尼娜:《汉魏晋时期东部鲜卑朝贡制度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4期。

高句丽在成为诸燕政权朝贡成员期间,仍利用各种机会寻求发展,积极向南北中原政权遣使朝贡。在前燕已灭亡,后燕尚未建立期间,高句丽小兽林王遣使向前秦朝贡,《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六》记载:小兽林王二年(372),“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前秦苻坚建元十三年(377),“高句骊、新罗、西南夷皆遣使入朝”^①。北燕取代后燕后,高句丽趁北燕政权初立未稳之际,连续两年向南燕遣使朝贡,南燕慕容超太上三年(407),“高句骊遣使献千里马、生熊皮、障泥于超,超大悦,答以水牛、能言鸟”。太上四年(408),“高句骊复遣使至,献千里人十人,千里马一匹”^②。拓跋魏国势日益强大,是北燕时刻防范的对象,这在客观上也切断了高句丽与北方王朝联系的通道。于是高句丽转而越海向南方政权朝贡,晋安帝义熙九年(413),“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③。宋少帝景平元年(423),“高丽国遣使朝贡”;景平二年(424)“高丽国遣使贡献”^④。

高句丽在与诸燕政权存在朝贡关系的同时,并未停止与诸燕政权争夺辽东郡县地区的拉锯战,后燕光始二年(402)五月,“高句骊攻宿军,平州刺史归弃城走”。四年,十二月,“高句骊寇燕郡,杀掠百余人”^⑤。《资治通鉴》卷113,安帝元兴三年十二月条曰:“高句丽侵燕”。金毓黻考证高句丽于元兴三年(404)占领了辽东。当时高句丽好太王时期,据《好太王碑》记载,这一时期好太王还四出征伐,驱逐倭国,使夫余、百济、新罗臣服高句丽^⑥,营建了以高句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5世纪初年高句丽占领辽河以东州县地区之后,将发展的战略目标转向朝鲜半岛,427年高句丽长寿王将王城由丸都城(今吉林集安)迁到平壤(今朝鲜平壤),高句丽与朝鲜半岛的百济之间的争斗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在拓跋鲜卑的强大攻势下北燕国势岌岌可危,北魏发动灭亡北燕战争之前,太延二年(436),世祖“遣使者十余辈诣高丽、东夷诸国,诏谕之”^⑦。但高句丽并未听从从北魏的诏令,而是出兵迎接北燕亡主冯文通,跟随冯文通迁往高句丽的北燕人户和携带物资“前后八十余里”^⑧,大大增强了高句丽的国力^⑨。

公元前37年高句丽建国便被纳入汉朝东北朝贡体制,直到436年北魏灭北燕统一东北之前,高句丽曾先后遣使向西汉、东汉、曹魏、孙吴、西晋、东晋、前燕、后赵、前秦、后燕、南燕、北燕、刘宋朝贡。汉魏晋王朝以边郡或设在边郡的机构管理高句丽的朝贡活动,虽然高句丽曾不时寇抄三朝边郡,但双方的朝贡关系基本处于持续而稳定的状态。东晋十六国时期,高句丽与诸燕政权的朝贡册封关系相对稳定,对其他政权的朝贡活动多为二三次,但这种多向朝贡活动实际可能要比史籍记载的多一些。

高句丽对前燕政权“贡方物以千数”,估计为马匹、貂皮之类物品,以示臣服,这和高句丽与汉魏晋的朝贡关系相似。高句丽向其他政权朝贡时,“献千里人十人,千里马一匹”、“生熊皮、障泥”等少量奇异珍物,这表明高句丽与这些政权的朝贡关系主要是一种外交关系。4世纪以来,高句丽抓住各族割据政权角逐中原的时机,尽力向郡县地区发展势力,虽几次遭到沉重打击,在恢复国力后仍不懈努力对外扩张,尤其在控制东北地区的各政权出现交替或呈衰落之势时,高句丽对南北政权朝贡活动表现得最为活跃。这表明高句丽的朝贡活动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希望在中原政权中找到强大的政治势力做靠山,以增强它在东北各族中的竞争力,尤其是助其在与诸燕政权的竞争中取胜。开展经济交往和引进吸收先进文化也应是高句丽进行朝贡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以至最后得到北燕亡国后都城人口和物质。上述种种都是高句丽由弱变强并在东北民族中发展壮大最快的原因之一。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高句丽文化、渤海文化发展及其关系研究”(10&ZD085)、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北民族朝贡制度研究”(06AZS002)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10JZD0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程尼娜(1953—),女,辽宁沈阳人,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郝红暖

①《十六国春秋》卷37《前秦录五·苻坚中》。

②《十六国春秋》卷64《南燕录二·慕容超》。

③《晋书》卷10《安帝纪》,第264页。

④《宋书》卷4《少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5页。

⑤《十六国春秋》卷48《后燕录六·慕容熙》。

⑥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171页。

⑦《魏书》卷4上《世祖太武帝纪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66页。

⑧《别本十六国春秋》卷15《北燕录》,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5页。

⑨《魏书》卷100《百济传》载百济人在给北魏上表中曾说:“自冯氏数终,余烬奔窜,丑类渐盛”,第2217页。